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人文与社会译丛

全世界受苦的人

Frantz Fanon

[法国]弗朗兹·法农 著 万冰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全世界受苦的人

Frantz Fanon

[法国] 弗朗兹·法农 著 万冰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世界受苦的人 / (法) 法农 (Fanon, F.) 著; 万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5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ISBN 7-80657-832-3

I. 全... II. ①法... ②万... III. 欧洲-殖民统治-非洲-
社会影响-研究 IV. K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681 号

Copyright © 1961 by François Maspero.
2002,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Franc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2002-124号

书 名	全世界受苦的人
作 者	[法国] 弗朗兹·法农
译 者	万 冰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200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89 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32-3/I·601
定 价	1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2002 年版序言

阿利斯·谢基

《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于 1961 年 11 月底由弗朗索瓦·马斯普罗 (François Maspero) 出版社出版, 当时本书的作者弗朗兹·法农因患白血病, 正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贝斯泰达 (Bethesda) 诊所里与死神作斗争。为了在付印出版时不被查封, 本书是在半地下的困难条件下印刷的, 它一开始发行, 便在“有害国家内部安全”的主要罪名下被查禁了。在 1959 年, 同样由马斯普罗出版的法农的前一本书《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个年头》, 以及其他一些有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作品 (如莫里斯·马施诺 [Maurice Maschino] 的《拒绝》, 莫里埃纳 [Maurienne] 的《背叛者》, 或早些时候亨利·阿莱 [Henri Alleg] 的《问题》), 都发生过这种事情, 这种查禁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然而, 此书却流传了, 且新闻界对它作出了巨大的反响。通过复杂的发送途径, 经由突尼斯, 法农于 12 月 3 日收到一本样书和一些剪报, 其中有让·达尼埃尔 (Jean Daniel) 于 11 月 30 日在《快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章, 可以说是篇赞扬文章。法农在听了别人给他读这篇文章后, 辩驳道: “当然, 但这并未诠释我作

品的精华。”几天以后，法农于1961年12月8日逝世，年仅三十六岁。

事实上，1925年他生于马提尼克岛上法兰西堡的一个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兄弟姐妹众多，童年时代在老殖民世界成长，那时他还习惯于对奴隶制探询。然而，法农在十分年轻时便参加了戴高乐主义力量——第五部队——重新整编加勒比人的志愿者。在这一投入的过程中，他获得了他那抵抗文化，但也体验了日常平庸的种族主义。复员后，他戴着十字军功章（是未来的萨朗[Salan]将军颁发给他的，他常说这是他同这位将军唯一共有的东西），于1945年回到马提尼克岛，通过业士学位考试，并常与受人爱戴的塞泽尔(Césaire)来往（他十分钦佩塞泽尔，但已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当时，塞泽尔决定把马提尼克岛看成是个法国的省。

法农很快又到法国，在里昂继续学医。与此同时，他热衷于哲学、人类学、戏剧，并很早就投入精神病学专业。同时，他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但参加一切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并协助编辑《达姆达姆鼓》，这是为来自殖民地的留学生而办的一份小期刊。特别的是，他于1952年在《思想》杂志上写了第一篇文章《北非的综合征》，文中他探究了北非工人，他们远居他乡，忍受成为一个“天天死去活来的人”之苦，他们被与自己的出生地和目的割离，变成一件物品，一件被哗啦啦扔掉的东西。

他在圣阿尔邦精神病医院待了十五个月，在医院里，法农很重要地遇见了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这是位西班牙裔的精神病科医生和反佛朗哥斗士。这对法农在精神病学方面及他未来投入战斗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医院里找到的是在他所有记载中探询的精神错乱的交点，而不是身体和精神的结合点，结构和历史的交叉点。1953年，他通过了精神

病院的医生资格考试。于是他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卜利达精神病院的医生。他的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已于1952年由瑟伊出版社出版,这多亏了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

在阿尔及利亚,法农不仅要面对精神病院里通常的精神病学,而且还得对付阿尔及尔派精神病科医生们关于“土著的原始状态”的理论。他逐渐发现当时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的现实。起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改造病科,他负责向病科引进已同托斯盖勒一起实施的“社会疗法”。他也因而不停地改变照料病人者和精神错乱者的关系,他同欧洲人,但也跟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著们”一起,力图恢复他们文化的语词所指对象,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社会生活组织,一切能成为意识的东西。这一小小的精神病学的革命既得到医务人员——大部分是参与政治者——的认可,也为当地的战士们所承认。法农的名声远扬。此时已是1955年,且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了。

法农不明白法国社会党政府面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竟这么糊涂,他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愈来愈闻名。“阿尔及利亚之友谊”运动同他接触,这是一个对政治犯家庭予以物质支援的人道主义协会,实际上由民族主义的活动分子们领导,他们与占领卜利达附近的游击队基地的战士们有联系。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请求是负责医治一些患精神紊乱的游击队员。

就这样,法农通过精神病学和政治活动之间的毛细作用,投入了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斗争。1956年,他在一次封致总督罗伯特·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的公开信中,辞去了自己那精神病科医生的职务,他在信中写道,他无论如何不可能想使一些人摆脱束缚,使他们“在一个把无权利、不平等和杀人当作合法原则的国家里规矩些,在这个国家里,当地人在自己的家乡经常精神错乱,生活在一种绝对失去个性的状态”。法农被驱逐出阿

尔及利亚。

然后于1957年第一季度,他在法国过了三个月,在此逗留期间,他对阿尔及利亚必然独立的信心并未得到反响。由于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法国总会的帮助,他抵达突尼斯,在那里设置了民族解放运动海外组织。中断结束了。

法农在突尼斯继续进行精神病学的和政治的双重活动。他成为FLN的日报《圣战者报》(El Moudjahid)的小组成员。他从内部目击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矛盾,包括目睹了政治代表和军队之间的愈来愈大的争论。尽管他经常感到失望,然而他仍然是位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捍卫者和经常革新的精神病科医生。他愈来愈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感兴趣,1959年底,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任命他为黑非洲的巡回大使。这是非洲国家独立的年头。法农真正是位巡回者,他不遗余力地从加纳至喀麦隆,从安哥拉到马里,以便推动为真正的独立而战斗。他甚至考虑一条从马里出发,穿过撒哈拉大沙漠和会合阿尔及利亚战士们的战线。

但是在1960年12月,法农在突尼斯逗留期间,发现自己得了髓细胞性白血病。他还剩下一年的活命,在这一年中他写了《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本书——惟一由他自己选定的书名而不是出版商选择的——是由一位自知患了不治绝症的医生所写的。

在跟时间和死神展开一场真正的赛跑中,法农想让人递送最后的使命。给谁?给受苦的人,他们基本上不再是十九世纪末工业化国家里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无产者。法农与之谈话的这些全世界受苦的人是贫穷国家里的不幸之人,他们真正地想要土地和面包,然而当时西方世

界的工人阶级——经常是种族主义的和显然对海外居民一无所知的人——显出对其从中间接获利的殖民地的命运相对地冷漠。

这部著作既不论述经济,也非社会学甚至政治的评论,它是一个有关殖民地国家的状况和变化的呐喊,甚至是个警呼。法农在整部著作中,紧绷政治、文化和个人的弦,重视对被统治者的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统治的后果。他着重分析了不仅是整个人民的,而且是一些个人的奴化,以及他们解放的条件,这种解放首先是个人的解放,是“人的非殖民化”。

《全世界受苦的人》是弗朗兹·法农的最后一本书。1952年他二十五岁时已开始写了《黑皮肤,白面具》,1959年写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个年头》,这本书是由弗朗索瓦·马斯普罗出版的早期著作之一。他也写了许多文章:已提到过的《北非综合征》,一些精神病学方面的文章,以及特别是在1956年第一次黑人作家大会上的《种族主义和文化》,然后是在1959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大会上的《文化和民族》。在所有这些文章里,论据的展开不仅是基于理论,而且建立在实际经验,他思想发展的出发点的基础上。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关于种族主义的思考与某些单方面宣布的文化统治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偶然事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涉及在工作中,同样也是在殖民地形势中的文化压迫制度。如果不阐明统治文化施行压迫的结果,那么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就是徒劳的,这种压迫触及团体、政治和文化,但也是精神的压迫。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继续对统治阶层所施加的奴役作这种探询。这个统治阶层破坏集体并使集体变质,也使个人在其变化中变质。此书重新采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论据和解放的条件,使其在政治斗争方面更激进,把个人的解放同

政治和文化结合起来。此外,在最后的两章中,一章是写文化及其与民族建设的关系,另一章是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双方产生的创伤性的精神错乱。

法农从自己的特殊经历出发,由贴近的经历写到他投入这一经过始末——他必须构思和传送的经历。作品本身遵循这个进展:构成这本书的五个不同主题的章节安排得像摘录,像一首诗的诗节,在这些诗节中掺入了一些严格的分析节拍,但正如年轻的法农在谈到他第一本书《黑皮肤,白面具》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节拍总是试图用一种除含义外,产生并非只受操纵概念束缚的理解的语言写就的。

人们曾可能且可以责备法农混淆了谈话的类别和水平——政治、文化和心理的分析——责备他搬移了精神病科医生的经验,这些对付精神错乱的材料并不适合政治领域。人们曾可能责备他的风格,认为这风格是抒情和先知性的。但异乎寻常,正是这种风格却成为法农的现代特色。作为精神病科医生,他那悬而未决的主观经验使他直接接触不幸的人们。

人们也责备他强调暴力。然而法农从经验上知道对个人施行暴力的后果:这个人对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借助不带个人色彩的铁石心肠或通过他间歇发生的可怕的暴力冲动进行侵犯。应该把这种暴力组织成为能导致超越的解放斗争,而不是否认它。在《种族主义和文化》中,法农这样对自己的治疗措施作出结论:“占领者的被扭曲和僵硬的文化得到解放,终于向成为兄弟的人民的文化开放。两种文化能互相对照,互相丰富。[……]一旦不可逆转地排除了殖民法,果断地承担起不同文化的互相的相对主义,就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他也指出这种黑人世界和白人世界之间的超越:“这两者都应摒弃他们可敬的祖先们的非人道的声音,以便产生真正的沟

通。”这种超越的观点也存在于《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中，尽管在此期间这种观点在政治斗争中激化了。

法农曾渴望萨特为本书写篇序言，岂料这篇精彩的序言似乎比书中本文的读者更多。然而，序言却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法农的忧虑和语气。它主要针对欧洲人而言，导致本文和他介绍的内容之间不和谐。法农本人是对所有其他人讲话，实际上是跟他们谈未来，在未来“对他人的畏惧”将被超越。这篇序言尤其激化了法农对暴力的分析。的确，萨特为暴力辩解，而法农是对暴力进行分析，并不把它上升为目的本身，而只是看作一个必要的过渡。因此，萨特的文章不时采用鼓动犯罪的语气。例如这样的句子：“读一读法农的书；你们知道在他们无能的时候，杀人的疯狂是被殖民者们的集体无意识”，或还有“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举两得，同时消失了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这些句子削弱了法农建议的意义，因为它们似乎不再是说明暴力的理由，而是在为真正的杀害个人作辩护。人们处在犯罪之中，而不再是处在这种一切人固有的暴力之中，这种暴力是为了能够存在于自身的可能中而发出的呼吁。法农在读萨特的序言时未作任何评论，一反他的惯常做法，他保持异常的沉默。然而，他却写信给弗朗索瓦·马斯普罗说他希望将来有可能表明自己的看法。

《全世界受苦的人》在七十年代被看作是本引路明灯之书，它主要结合第三世界主义，优先政治的突出部分，牺牲了他对被压迫者所处的精神错乱的原由一再探究，然后，将此抛到脑后，随之法农的整部著作被视为过时的。他的政治胆识被认为不再适用——既然这胆识同所谓过时的非殖民化时代结合在一起——以及带来由事实使之落空的希望。法农是否高估了农民群众在解放斗争中的力量？碰巧当时在阿尔及利亚斗争的背景

中,大部分战士正是农民。我们别忘了法农是在写一丝不苟的历史经历。然则,正如他在《全世界受苦的人》第二章《本能的伟大和弱点》中解释的那样,他认为农民的积极性也能像革命一样,同时产生反响。

他是否低估了宗教的力量?事实上,他重又参加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并不表现为伊斯兰教的革命,它团结各种不同倾向——1956年的苏马姆河大会纲领——,尽管其鼓动者们反对,但大会并未提出宗教中心论,倒是提出要依靠多数。法农呼吁正在进行非殖民化的国家创新,创造一个新人,这个呼吁不是被非洲国家的变化撤销了吗?后来的地理政治论的发展不是与他所有的希望背道而驰吗?事实上,这种发展倒是证明了他担心的变化不是凭空无据的(在《民族觉悟的不幸遭遇》一章中)。

法农分析一个偶然的现实,而如果人们将他的书限制在他那时代的背景下,他的书则只能被理解为“落后于形势的”,而不是被理解成一种对可能的东西的呼吁。他从现实出发,表达自己的希望。是否他的希望未实现使得这现实变成错误的了?大家清楚知道这个现实,包括暴力这一现实,今天在说到它时已不再用殖民压迫或第三世界的未来等字眼,而是说成为不平等的扩大,南北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排斥,把庶民简化为物等等。

非殖民化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四年之后,大家见到一个向经济世界化的“强权”前进的世界,这个现实写在南北关系中并一天天显出轮廓:非洲国家的政府安排了有组织的腐败并使之成为制度化,发达世界的石油、医药及其他的大公司建立的这种腐败。同时,以不干预的名义,但尤以要维持经济上的帝国主义的名义,就是这个发达世界却对损害一切渴望民主的解放运动、损害一切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参与活动的行为,表现出无动于衷,法农梦想这种管理,并为此他从已从事的精神病科医生变成被

压迫人民事业的斗士。

但这个现实不仅仅涉及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它也关系到我们那所谓“发达”世界中的不平等的扩大,在这个“发达”世界中记录着那些贫困的人必然的生活不稳定和失业,哪怕是给这种必然性一个局部的位置而不是个空想的位置:这就是排斥的位置。法农驳斥这种现实,因为他不愿每个人的生活是“死到临头”,每天苟延残喘,这使生活被理解为“不是欣欣向荣或繁荣昌盛地发展,而是经常和身边的死神作斗争”。法农渴望凡是人都是自己历史的主题和政治的主动者。

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从阿富汗到中东,不免除美洲和欧洲,绵延着一个处于战火和血腥中的分裂世界,在那里,暴力不断,接踵而至,那里的国家感到震惊,并对他们挑起的民众暴力感到愤慨,这种暴力造成使人失掉人性的恶性循环,在个人的和集体的层面上破坏二十一世纪的几代人的思想、生活和未来。

今天,人们又谈论阿尔及利亚战争,现在终于把它称作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三十五年中,它被叫作“事件”。人们重又披露和揭发酷刑。但许多现代文章对当时冲突的两个阵营的暴行却背对背地推卸责任,不利于对武力不对称的分析。法农曾对他当时的两个世界的力量比例作分析,这两个世界互相隔绝,排除一切对话,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难道不仍然在这么干吗?要明白这点:当两个世界之间不缔结任何一个条约时,当通过话语进行考虑的一切空间再关闭上大门时,当较强的世界自称是另一世界场所的拥有者时,不管这个场所是领土、文化或心理的,那么什么东西发挥作用呢?正是对这个世界的预料警告了法农,并促使他写《全世界受苦的人》。

他也觉察到战争——包括解放战争——的创伤性后果,无休止的后遗症,导致暴力的重演和种族的、同一性的倒退。这些

倒退经历正在结束的世纪的历史,并在一个既新而又十分古老的想法的基础上开创新的世纪:把另一方表现为邪恶的化身,而把自己表现为善良的化身。法农已在其《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分析殖民地的形势时描述了这些形象:殖民者认为被殖民者是邪恶的化身。此外,他指出这种外形化在主观上所起的破坏性后果:被指为邪恶者受到监督,先是感到羞愧,然后是仇恨。这个过程今天具有奇怪的现实性。

因此,必须超越写这部作品的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并根据我们的现代特色来重读《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在南方及北方,被发展所遗弃的人成倍增多,且还有人们那不断增大的屈辱和主观上的压垮,面对全球化,这同样的现代性把所有这些人轻飘飘地指定为“一无所有”的人:没有祖国,没有国土,也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身份证件,没有说话的空间。

读一读或再重读一下《全世界受苦的人》能帮助了解当一些人这样地保持在被剥夺的记载中时所发生的事:暴力,求助于种族和同一性的倒退。但除了这些强调的主题外,法农的现实性还在于:一方面,在一个背对背地互相推诿的时期,他有预见地、唯物主义地分析精神错乱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对人的存在主义或文化主义的看法(或甚至在心理分析方面,一种割裂周围世界的主观冒险的观点),他试图设立一个介绍身体、语言和精神错乱的知识新构成,作为政治前途构成中的必要经验。这种尝试其实离马尔库塞(Marcuse)的尝试并不那么远,或者更进一步说,离维也纳的政治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忧虑也不远,他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逃亡到美国,遭到排挤和压迫。

那么,法农之所以表现为一种世大的现实性并非偶然。从他的出身和经历,到对这一时期突出的受创形势作斗争,都印证了上世纪的那些事件,而他则是事件中的角色之一。

从他的生活和思想活动来看,他也是现实的: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和排斥个人的时代里,年轻的法农所写的那句将他的全部思想付诸行动的话“啊,我的肉体,你要始终使我成为一个爱提问的人!”超越了人们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垮台,在我们时代的许多年轻人心中引起共鸣,不论他们讲什么语言和出生于何地。

1961 年版序言

让-保罗·萨特

不太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居民，五亿人和十五亿土著，那五亿人掌握圣言，其余的借用圣言。一些被出卖的小国王、大地主和一群伪造的假资产阶级充当这五亿和十五亿之间的中间人。在殖民地，真相暴露无遗；宗主国则喜欢掩盖真相；必须让当地人喜爱他们，可以这么说，像爱母亲那样。欧洲的精英着手制造优秀的殖民地土著；他们选择一些青年，用烙铁在他们的额上印上西方文化的原则，在他们大打哈欠的嘴里塞进一些黏糊糊的豪言壮语，把他们的牙粘住了；在宗主国短暂逗留后，把他们遣回他们自己的老家，弄虚作假。他们的弟兄们对这些生动的谎言再也没什么兴趣了；谎言四处回荡，从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我们喊出“帕台农神庙！博爱！”之类字眼，在非洲和亚洲某些地方，一些人张口就是“帕台农……博爱！”这是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结束了：只是嘴上这么说说而已；黄皮肤和黑皮肤的发言人还在谈论我们的人道主义。但这是为了谴责我们的不人道。我们高高兴兴地倾听这些苦涩的奉承话。首先骄傲地惊叹：怎么？只是他们谈话？然而，要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培养！我